

云南苗族文化丛书

# 中国石门坎

(Δ° 6δ Δ' T^n J' ° [ ' n' ' ) " L\_n C\_

## 百年影像纪实

┌ J' n C' [ ' n' T^n 3^ 3. J\_u J' [ n'

图/张健 陈启基

文/杜应国

云南民族出版社



## 《云南苗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王文宪 王兴光 朱文光 朱艾光  
朱祥熙 吴耀明 张 坦 张慧真  
杨智光 杨忠信 杨明光 沈 红  
娄发文 陶丽琴 熊明海

总 策 划：王时炜 王悦鉴

编 委 会 主 任：古文凤 熊玉有

编 委 会 副 主 任：张雍德 李树伦 杨 莉 杨风华  
杨照飞 陶树清 熊 美 熊丽芬

主 编：朱佶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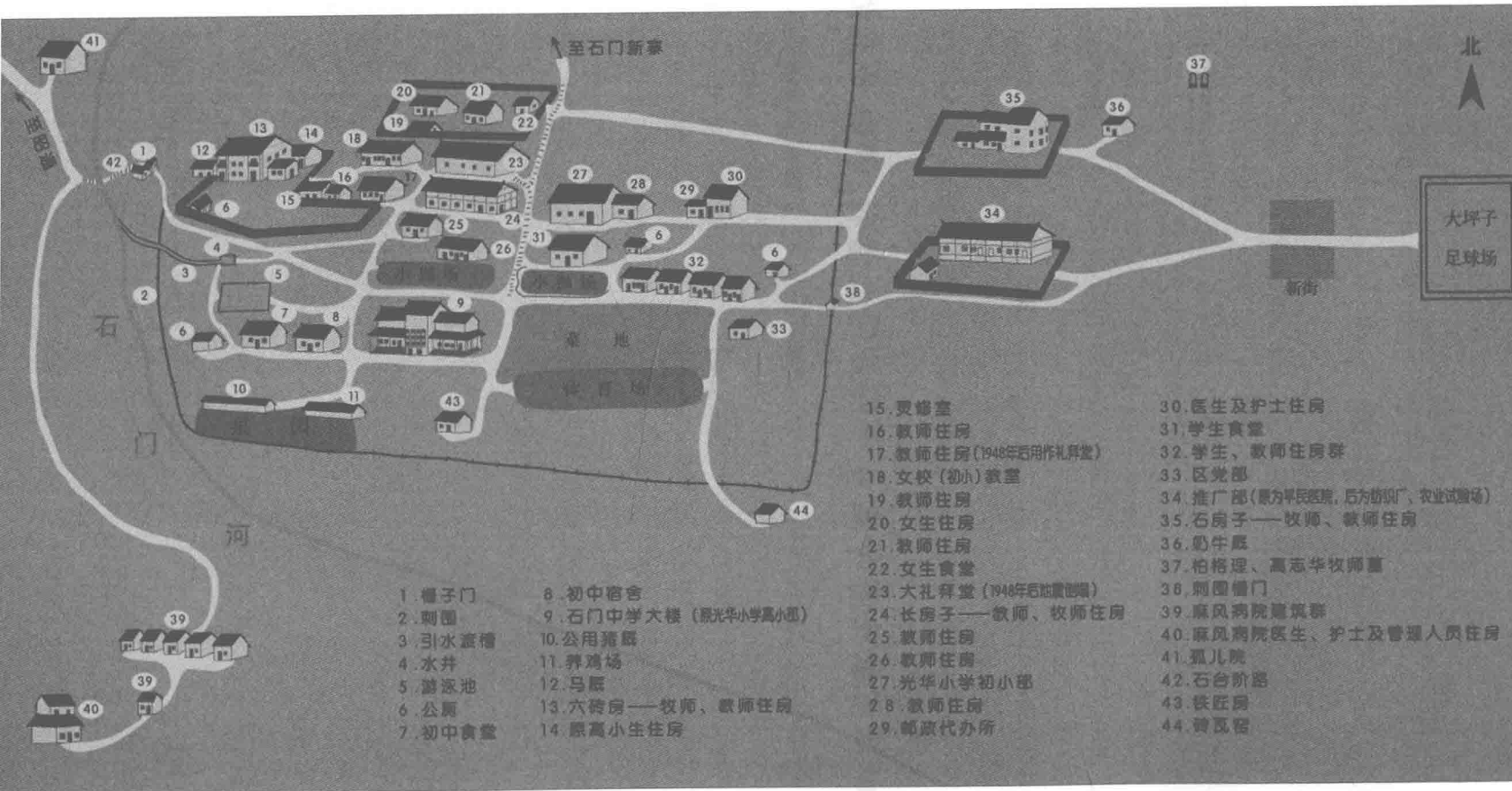
执 行 主 编：朱玉芳 张 健 陶绍虎

编 委：马理荣 马亮明 王礼绍 王国华  
王国英 吴耀华 张建明 李文汉  
杜应国 杨世武 杨洪美 杨体耀  
杨健康 陈启基 陶 瀛 陶绍飞  
韩 箭 韩亿国 韩朝美 熊宗盛

苗 文 审 校：陶绍虎 朱玉芳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在中国石门坎播种、耕耘的人们

# 20 世纪 40 年代石门坎基督教会社区分布图



此图摘自沈红女士著《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

## 回响于云贵高原的文化足音(总序)

沈红

隆冬时节,云南民族学会苗学研究会的老教师们辗转送来关于石门坎历史的3部书稿,名之为云南苗族文化丛书。这是我期盼许久的书,凝聚着石门坎几代校友多年心血。一页页读下去,一幅石门坎历史长卷朴素展开,我追随着作者,追随翻越崇山的苗族先行者,靠近心中那片高地。年轻学子的歌声回旋天际: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

石门坎百年步履声如雷滚过,一个世纪的风浪奔腾而来。

书中的人物,不限于那个赫赫有名的小山村石门坎(苗家称为卯岭南),而是来自石门坎文化圈——一个跨越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行政边界的少数民族文化区,我称之为“石门坎文化圈”,其文化版图辐射远近20个县,包括贵州省的威宁、赫章、毕节、紫云、织金,云南省的昭通、彝良、镇雄、威信、大关、盐津、永善、东川、水富,四川省的高县、珙县、筠连、叙永等地。

石门坎文化圈的出现自有其科学规律,以社会学而言,石门坎文化的超常规发展获益于独特的结构增长方式和制度安排,即:学校—教会的联体共生制、教师—教士的身份共有制,以及苗族教师的人才流动机制,多种制度协同作用,促使石门坎文化模式获得自我复制能力,不断传播到更多苗寨、更广地域。正是在这种复制和传播中,现代教育网络和宗教传播网络相互嵌入,成功塑造了广义的石门坎文化。

作为卓有成就的现代教育网络,石门坎曾经领导着黔西北、滇东北、川南少数民族地区近百所乡村学校,构建了20世纪上半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作为宗教传播网络,以石门坎为起点,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开辟了威宁四方井、威信牛坡坎、永善大坪子、彝良咪咄沟等百余处乡村教堂;同期,以武定洒普山为中心的内地会传播网络也发展迅速,成为石门坎文化向滇中延伸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苗族文化社区。作为少数民族文字网络,石门坎苗文甚至跨越民族界限,向彝族、傈僳族地区传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帮助同样不能使用自己文字的贫困族群初次获得了文字权。

书中的故事主人公和记述者,正是来自这个幅员广阔的石门坎文化圈。20世纪初的苗族先行者,如旷野火炬穿透严寒迷雾,而今天的苗族后代如何记忆由石门坎生活带来的光荣或承受的苦痛?这些朴素平实的文章,用汉字书写,出自苗族同胞之手,是尘封久远的底层记忆开启后的民间写作,是以苗族人民为主体自我书写的历史,令人敬佩。

拿起笔来,记录从先辈到自己的生涯,对于苗族这样的贫困族群具有重要的主体性意义:促使苗族作为认知主体,主动参与苗族乡土文化的调查整理、积累传承,唤起文化自觉;促使苗族作为能力主体,致力于现代教育普及提高、现代知识人才培育,焕发民族自信;促使苗族作为权利主体,维护本民族的文字权,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字传统。

陶绍虎老师主编的《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一书,收录了70多位苗族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展现给读者的,既有跃马扬鞭于虎狼之地的热血男儿,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乡村女教师;既有学识渊博的苗族博士、医生、畜牧专家、苗文专家,又有多才多艺的民间音乐家、传教士、社会活动家;既有经历暴风骤雨的革命者、保家卫国的军人,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有为之士,更有为保卫石门坎文化尊严而献身罹难的山村老师。尽管每个人职业生涯缤纷各异,却仍能看到共同点:他们都曾执教于石门坎文化圈的山区学校,为成千上万的苗族同胞播撒希望。这部书稿是由一篇篇亲人们的回忆构成,由于浸润了亲情、友情、爱情和师生之情,笔墨中含有冷暖温度。单篇阅读可以观察一段长短不拘的石门坎人生,整体连缀起来就成为颇有气势的一组群体雕像,前辈们的身影如同层峦叠嶂的群山一般,交相呼应。

朱玉芳老师撰写的《光华之子——我的父亲朱焕章》,聚焦于群山中的一座高峰,这是一位苗族领袖和平民教育家的传记。作者历经10余年努力,采集整理,翔实记录朱焕章校长致力于偏远山乡平民教育、推动苗族与其他民族共同进步的人生道路。通过一位女儿真切的回忆和讲述,朱校长的一代风华、一生跌宕,连同充满人情慰藉的生活细节,生动呈现,令读者捧读之际心生敬佩并扼腕长叹。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再版了朱焕章编纂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也称《滇黔苗民夜读课本》,这套教材70年前普及于乌蒙山区,为成就西南平民教育运动立下汗马功劳,这份历史文本十分珍贵。

这两本书以苗族师生的集体记忆形式面世,是民族教育研究、社会结构研究、文化传播史、基督教传播史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宝贵文献,且因语言通俗晓畅,还可以成为今天少数民族青少年和贫困学生励志进取的读本。

《百年影像纪事——中国石门坎》是一本图册,少部分图片摄于20世纪早期,来自柏格理、张道惠、王树德等英国传教士和当年的苗族教师之手,大部分照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陈启基先生的摄影作品。那些苍凉的黑白镜头之中,是一位贵州摄影师在黔西北高原的寻找和跋涉;那些撼动人心的画面之外,是一位汉族朋友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关切和体察。实际上,这百年影像中存在半个世纪的影像空白,而另两本书中石门坎人的回忆文字,勾勒出西部苗族经历的部分坎坷。

石门坎文化是西部苗族一度收获又一度失落的传统,它能否成为重新振兴的起点?如何理解和概括石门坎精神?关心苗区发展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石门坎文化价值和意义。

《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中有“音皆谐兴涌畅,天下一家共乐一堂”的词句,引导学生

以开放的胸怀“为中华之光”。

朱焕章校长为石门坎初级中学撰写的校歌有“力到此疆树边黎，服膺主义臻大同”的词句，号召师生们投身于偏远山乡的贫困民众的教育事业，走共同发展的大道。

云南杨智勇先生说，那些在苦难中升华了苦难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贵州朱正良先生说，政治平等不等于文化平等，文化平等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云南杨世武先生说，石门坎文化激发了对爱的信仰，引导人向善的天性和本能，不要带政治偏见看待它。朱祥熙先生说，石门坎学校培养的是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贵州杨忠信先生说，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发展，是石门坎文化积极意义所在。教育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心声，是改变一个民族的先声。从石门坎走出的知识分子，无论走出多远、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职务高低，都有回母校为石门坎建设添砖加瓦的念头。

云南司隶先生说，学有所成后用其才智去帮助同胞，这是石门坎先辈们苦苦追求的。

贵州杨明光先生说，石门坎是滇东北方言苗族的新文化发祥地，石门坎文化价值在于5个方面：促进苗区民族教育及文艺体育的兴起昌盛；促进民族团结，既消除苗、汉民族隔阂又增强苗族内部团结；改革陋俗、讲卫生重健康；创制苗文、发掘苗族古老文化；促进技术进步，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从粗放单一的农业到农牧业技术、纺织技术的引进和改良。

云南朱艾光先生说，石门精神含义丰富，它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坚持把教育办在农村的教育方向，是既能请（教师）进来也能送（学生）出去的办学方针；它又是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发展的文化实践。

贵州顾久先生说，石门坎文化是贵州原生态文化与外来文化一次最成功的和平的融合。张坦先生认为，从中国与世界来看，它是研究普世价值与东方文明关系不可多得的案例。

在笔者看来，石门坎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共同构成石门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文化创造，双向开放。

石门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文化、苗汉民族传统交流的奇异花朵，活力出自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以及民族社区对外、对内双向开放与交流。在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一种民族文字——石门坎苗文——跨越民族边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字网络；一所苗民学校发展壮大为乡村基础教育网络；一所山区教堂发育延展为影响广泛的乡村宗教网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石门坎苗文跨越地域、民族边界传播，帮助同样不能使用自己文字的贫困民族获得了初步文字权。

其二，苗族主体性，民族自觉。

石门坎文化唤醒了贫寒的苗族子弟的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既体现在他们自立自强、追求卓越的主人翁精神，以及绝境逢生、救同胞于危难的共同体使命感，也体现在学校尊重教师和学生的文化选择、信仰选择和流动自由等方面。

其三，以苗教苗，薪火相传。

石门坎文化和教育的自组织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联体共生的学校——教会网络成为师资储备库，促成了以苗教苗、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大规模教育实验，确保这一场平民教育运动得以有序有效地展开。

其四，西部乡村建设的向心力。

石门坎历史同样具有乡村建设实验特点，它引领了一场具有西部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堪与东部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相伯仲。石门坎文化圈的扩展与民国史上东部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共同之处是二者都在平民教育、社区公益设施、文化建构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实践，其区别在于石门坎更重视苗民参与和集体行动，更具向心力，结果使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

如果这些提炼尚不足以涵盖石门坎文化的全部价值，通过阅读，相信读者会获得自己的见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很难想象，这些并不华丽的书稿具有怎样的重量。它承载着石门坎人及石门坎以外关心石门坎及其整个苗族族群的人们对史料的追寻，寄托着他们对失落传统的呼唤。西部苗族自古因命运多舛而迁徙四方，流徙奔波曾经是他们应对恶劣生存环境的消极适应方式。正是发轫于石门坎的乡村教育运动，才为苗民奔赴远方求学、巡回办学，以及延续至今作者们的奔走游历注入了现代意义。

在《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一书中，我这样写道：

他们表达的是一群苗族知识分子追怀历史的深刻焦虑与锥心之痛。他们唯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力保存恢复原来的文化生活样貌，编织记忆和意义之网。和他们相处，深深感受到贫寒生活中的文化自尊。

每当石门坎社区风云激荡之际，群山深处就会传来苗民寻找的脚步——那些被驱赶的、被掠夺的、被阻拦的苗民，奔走不息，寻找和保护他们失落的文化。

每当他们放下悲欢荣辱、前赴后继的时候，他们愿意相信自己从此站起来，做了主人。

阅读和聆听，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历史。

聆听这些回响于云贵高原的石门坎人的脚步，这些西部苗族迈向现代文明脚步。他们徒手攀登，登上了西南民族教育的高峰；他们戴着镣铐，曾踏出了西南民族文化最强的节拍；他们赤足奔跑，却达到了那个时代最快的速度。

## 序(一)

张 坦

石门坎进入历史的视野整整 100 年了。

那是怎样的 100 年啊!风起云涌、天翻地覆、英雄叠起、万众瞩目!曾经的海外天国、曾经的香港第二、曾经的苗族文化复兴圣地、曾经的苗族人才孵化摇篮……当柏格理、高志华、杨雅各、朱焕章、张斐然甚至后来的费立波等鲜活的形象变成一座座荒茔,100 年来留给我们最可贵的只剩下记忆。

有一天,陈启基、张健二君来找我,提着台笔记本电脑,一打开——那久违了的人物鲜活地扑面而来,使我忍不住老泪横流。这些石门坎 100 年来的照片发黄发黑甚至模糊,却是这百年辉煌、百年沧桑最直观的见证!二君说,这些照片有的来自遥远的海外、有的来自偏僻的苗寨,他们花了几年的艰辛去收集,我再一次为二君的热忱泪流满面。

16 年前,我在写作《“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并不担心读者是否认可它,而是苦于见不到这段历史的物件尤其是照片。之后,随着众多的有识之士不断地深入到石门坎去开展研究和石门坎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看到了东人达的译著、沈红的研究中有了一些宝贵的石门坎历史照片。今天,陈启基、张健所收集、整理、拍摄的《中国石门坎——百年影像纪事》更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石门坎百年图片史。感谢本书,使我们又有了一个再次聚焦石门坎的理由和机会,它使我们的记忆更加形象、更加鲜活、更加直观。

## 唤醒记忆(序二)

蓝庆伟

在仔细看完《中国石门坎——百年影像纪事》书稿后,很难想象这是我所认识的一位艺术家——陈启基(么哥)参与完成的工作。如果将该课题以文字而非图片阐释,想必会是一篇博得喝彩的艺术史研究著作,让人想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著名汉学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先生对山东冈山基督教及其仪式情形的研究——当然冈山已经以摩崖石刻被我们所知。

意义是我们经常追问的词语,而在这本书中,我们更多的可以读出编者所难得具备的理性,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既是该书不断完善与修订的过程,同时也考验着他们的耐力。但明显的是这比曾经游历中国并写下《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要幸福很多,《马可·波罗游记》与清末诞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外销画有着“发生在中国、推介在西方”的共同性,而编者的工作关注的是“亲身经历的历史”。这同时也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时间推移中促进着社会的进步,人类除却了解未知的他方世界时也更加的关注着自身的发展与脉络。《中国石门坎——百年影像纪事》用西方人的经历推陈出一部基于中国区域性典型个案的神秘世界。

在艺术史的研究中,有两个关键词的方法经常被使用——语境(context)与个案研究(case study),我们很难莫名地对一件事情发生兴趣,一旦我们要将兴趣进行转述,最为典型的不同则是对象的差异与语境的不同。作为转述历史有效载体之一的书籍(传播物)需要著作者进行足够的历史研究与基本的上下文情境的提供。本书更加侧重于打造一本由图像所构成的个案研究,我更多地将本书看作是一件艺术作品,只有在这样的理解维度上才能更好的体会编者在唤醒的那段记忆。

# 目 录

---

总序 .....	001
序一 .....	005
序二 .....	006

走进石门坎 .....	001
-------------	-----

在中国大西南的云贵高原,在有“世界屋顶”(柏格理语)之称的乌蒙山区,有一个在地图上也很难找到的名字——石门坎。这里是滇、黔、川3省的交角,群峰耸峙,绵亘无际,山高水险,路邈人稀,在一片云遮雾罩中,更显荒冷、神秘。百年前,仅有10多户苗族人居,是贵州省威宁县的一片属地。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石门坎却以“西南苗族的最高文化区”而蜚声海内外。

凝固的历史 .....	040
-------------	-----

我来到那些早已成为废墟的旧迹遗址,在倾颓的断壁前、在伫立的破败中、在裸露的屋基和倒卧的乱石里、在那千年不变的风中雨中,寻寻觅觅,仔细查阅着匆匆岁月留下的点点痕迹。

百年脉绪 .....	060
------------	-----

自从1904年在云南昭通柏格理暂住地的门口出现了4个风尘仆仆的苗族汉子——第一批苗族寻访者之后,寻找“爱稣”(耶稣)的苗族人便一批批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有时是几个、十几个,有时是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最多的一天,据说竟来了上千人。

世纪庆典 .....	086
------------	-----

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成群结队,汇聚一堂,自发地来到石门坎,共同庆祝100年前那个看似寻常实则却意义非凡的开端,那个孕育了最早一代苗族知识分子的伟大起点。

# 目 录

---

## 边缘群落 ..... 120

在距石门坎不远的一处荒坡上,有一个孤独的小村子,人烟稀落,一片沉寂。单从外表看,这个小村庄与别的村落并无什么不同,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似乎总缺少点什么。是什么呢?是在正常生活秩序主导下任凭什么也掩隐不住的活力与人气。这是一个特殊的村落——麻风村。

## 大山之子 ..... 140

也许,对于他们来讲,严酷的环境,贫瘠的土地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但他们在面对贫困、面对生活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坦荡、从容,那种坚忍、顽强,却同样动人心魄,令人震撼。他们是强悍的,也是朴实的,一如他们身后那浑厚、沉实的大山。是大山锤炼了他们的筋骨,赋予了他们宽厚、仁慈的心胸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 高原印象 ..... 174

地处云贵高原中部的乌蒙山区,是贵州西部地形最复杂,抬升最强烈,切割最破碎的地区之一。这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鸟道羊肠,人烟荒寂。大自然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力,在这里制造了矛盾的两极——最险恶的地貌和最壮美的景色。百年前的柏格理,在一次次为这种壮美惊叹的同时,又一次次为它的凶险而心悸、胆寒。

## 后记 ..... 218



走进石门坎

## 走进石门坎

在中国大西南的云贵高原,在有“世界屋顶”(柏格理语)之称的乌蒙山区,有一个在地图上也很难找到的名字——石门坎。这里是滇、黔、川3省的交角,群峰耸峙,绵亘无际,山高水险,路邈人稀,在一片云遮雾罩中,更显荒冷、神秘。百年前,仅有10多户苗族人居,是贵州威宁县的一片属地。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石门坎却以“西南苗族的最高文化区”而蜚声海内外。

这一切,都源于一位名叫塞缪尔·柏格理的英国牧师。

1905年,居住在昭通城里的柏格理挡不住一批批远道而来的苗族寻访者的热情,毅然从厅堂走向荒野。他们来到荒冷的石门坎,从一位名叫安荣之的彝族土目手中无偿获得了10英亩(约合60亩)的土地,便在这里建起了一所同时兼做学校的简易教堂,由此诞生了第一所专收周边少数民族子女(入学的学生主要以苗族居多)的学校——石门坎光华小学。令柏格理始料未及的是:由他开垦的这“第一犁”,竟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苗族追求文明与复兴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其同道和后继者的推动下,石门坎创造了许多堪称中国之最的划时代纪录:苗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波拉德符号文字,石门坎苗文或称老苗文)、自己的学校,而且是最早的男女同校;还有乌蒙山区的第一家平民医院、第一所孤儿院、第一个足球场、第一个游泳池以及西南地区的第一所麻风病收治院;从这里走出了第一代苗族大学生、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一时之间,滇黔川一带跋山涉水到这里来求学的各民族贫困子弟不绝于途。以致连柏格理也不能不惊叹:

“复兴并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方式到来。我们指望在花园里经过培植的小块土地上显现花蕾,上帝却让山花在荒野中突然怒放。我们盼望着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上帝却击穿峭壁,让巨大的山泉从中涌出。”(《苗族纪实》)

1915年,柏格理因染上伤寒不幸去世,终年51岁。

但他的事业仍在他的同道和继任者的推动下继续发展。他们是:弗兰克·邵慕廉、张道惠(Rev. Harry Parsons)夫妇及他们的孪生子张绍乔、张继乔兄弟,还有王树德先生(威廉 H. 哈兹佩斯)、甘铎理先生等等。

让我们随着下面这些老照片一起,走进石门坎、走进柏格理和他的工作群体,去触摸那段隐沉在大山深处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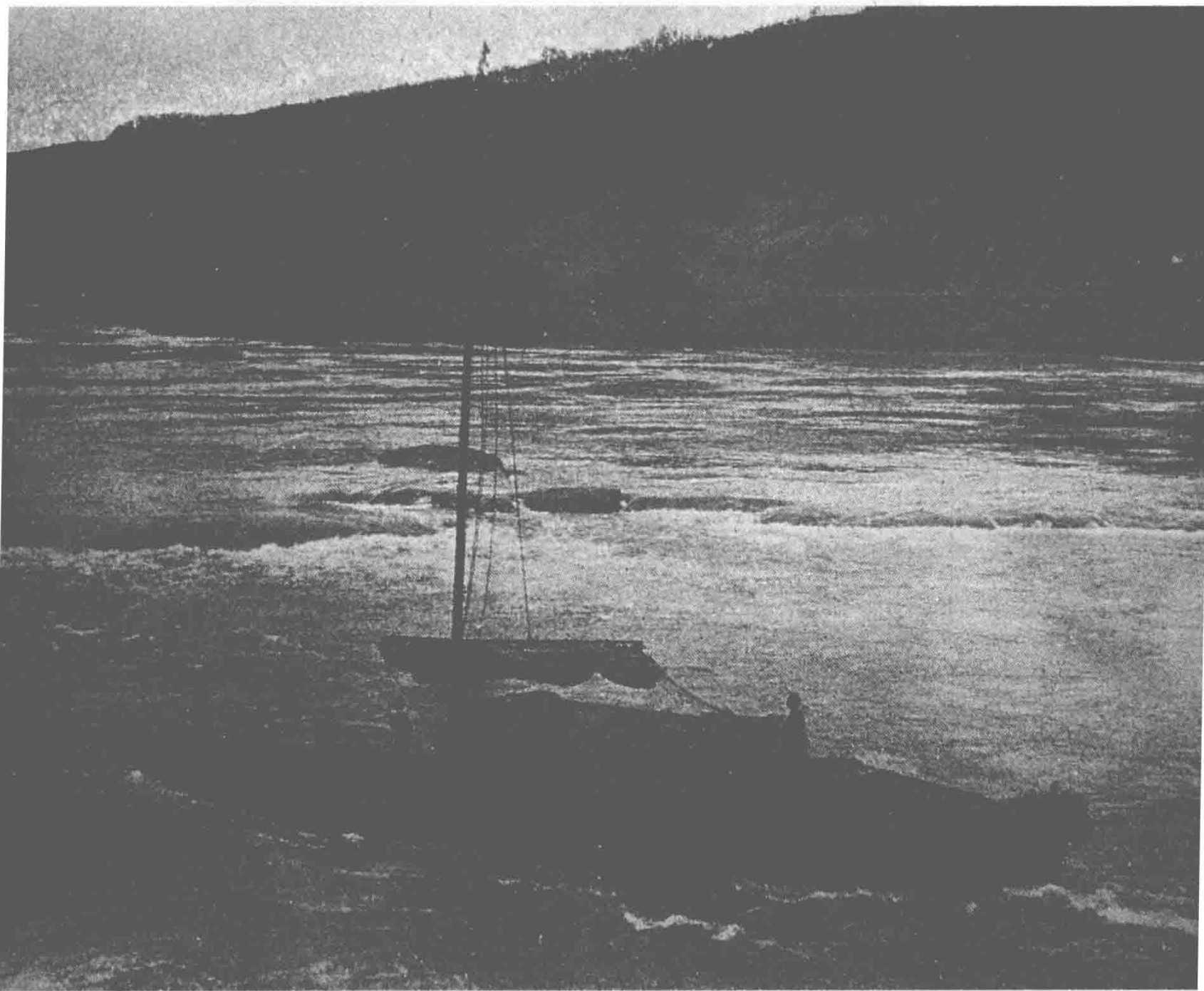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的塞缪尔·柏格理(Rev.Samuel Pollard 1864~1915)。1886年,柏格理与邵慕廉来到中国,先到安庆学习汉语。1887年,溯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他俩的服务地——云南昭通。此照摄于1894年他第一次返回英国休假期间。(东人达提供)



塞缪尔·柏格理和他的夫人埃玛·韩素音。他们于1891年在重庆结婚。1894年长子塞姆·柏格理在昭通出生。他们都身着中式服装,使用着中式的家具。看得出,为了融入中国文化,柏格理几乎改变了他自身除容貌之外的一切。(东人达提供)



19世纪末的宜昌港口。1887年,柏格理、邵慕廉与万斯通夫妇首次乘船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在这里改乘载重量较小的木篷船上溯重庆。(选自柏格理《苗族纪实》,东人达提供)



1896年,因山崩形成的长江新龙滩。1897年,在卸下所有货物后,由几十名纤夫拉着柏格理一行人的空木船通过了这道险滩。(选自柏格理《苗族纪实》,东人达提供)